“那时博济医院是贵族医院”

采写/本报记者 谢冠琦

编者语：从1903到2013年，中山大学护理教育已经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而孙逸仙纪念医院亦走过了178岁的沧桑华年。隔着宽阔的时光之岸，也许远去的不止是一截漫长的岁月洪流而已，更有光阴倏忽间曾经闪耀的一帧帧历史画面，一段段物事尘缘；重温那些画面，如开启传说中的月光宝盒，尘封的风华岁月，沉睡的故人故事瞬间鲜活如昨，暗涌相随的还有那掩藏经年却从未褪色的温情与感动……本报记者专访孙逸仙纪念医院李桂珍、胡筱两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护士，共同为您回顾当年博济医院的点点滴滴。



年轻时的胡筱护士



1948年毕业典礼照



年轻时的李桂珍护士

有一次，红线女来内科住院。我们的内科主任和医生都对她感到非常好奇……

一、轰炸声中的护士梦

记者：两位老师为什么当年选择考护校呢？

李桂珍：因为当时(1944年)家庭比较困难，而读护校则全部免费，吃饭、住宿等也是全包，不用自己掏钱。另一方面，看到护士这个职业很好，可以为他人服务，穿的衣服又漂亮，所以就心动了，有了考护校这个念头。

胡筱：当时读护校还有工人帮我们洗衣服、洗鞋子。牙膏没了，自动有工人补放进去。

记者：入学时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胡筱：我是初中毕业。

李桂珍：我初中还没毕业，当时在南海一中念初二，学校因为战火解散了。然后，我就想办法考进入了护校。

胡筱：我们俩都是1944年入学的，分到同一个班。我们读书的时候，正值抗战末期。当时，广州还有日本人在，日本人经常搞轰炸。一听到警报，我们就到躲到博济楼旁边的讲学楼那里集中，因为那里是最牢固的。我们还曾经试过半夜起来走警报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炸海珠桥，那最吓人了。

李桂珍：我初来乍到，看到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人抬进来，心里直发抖。

记者：那当时的护校是在医院里面吗？

李桂珍：我们入学的时候没有正式的护校，全都在医院里。六楼是宿舍，有几间课室。

胡筱：我们的护校是当时的博济医院设立的，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医院的领导，一位是护士主任。当时的院长是美国人，叫嘉惠霖。我们称他为“家公”，称他的爱人为“家婆”。“家婆”最赞赏她(李桂珍)了。

李桂珍：我不懂英文，因为念初中外语课被迫学的是日文，记得是中国人教。当时嘉惠霖的夫人在博济医院教英语，可我连“A、B、C”都不会，她看到我学得很吃力，就特别照顾我。

胡筱：当时医生开处方也是用英文。

李桂珍：有时候，我开医嘱也只能照抄，因为既不会读，又不会写。

胡筱：其实他们夫妇俩都很关心我们的。每逢过节，他们就会邀请我们这些护生到他们家做客，并做一些西式糕点给我们吃。

记者：当时的课程都包括些什么？给你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什么人呢？

胡筱：护理学、化学和药物学。其中护理学最重要，那本书是最厚的，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考试也分为笔试和操作。护理学教得很细致，就拿铺床来说吧，病人麻醉和手术后的铺床方式都是不同的。

李桂珍：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医生，都是很高级的。多数外科医生都是讲广州话的，还有部分医生是留学回来的。护理学是校长负责。上护理课的时候，老师还用一个玩偶给大家示范如何帮病人洗澡。我们当时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不像现在。

记者：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呢？需要值班吗？

李桂珍：以前全靠我们这些护生工作的。早上护生要“出房”，也就是出病房工作。高年级的护生负责打针、发药，而低年级的护生帮病人擦身子，类似于现在的护工工作。一层楼只有一个护长，护长底下全都是护生在工作，没有什么助理护士、护理员。

胡筱：需要值班，低年级的护生一般是值日班。曾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在我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死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

记者：两位老师在护校总共念了多少年呀？

胡筱：我们俩是一起毕业的，一共念了三年六个月。如果在学习期间，请了病假或者事假，医院就会记录下来，请一天假要补三天。有一个现住在附属二院附近的老护士，当年就整整补了一年多。

记者：当时的护校管理是不是很严格呢？共有多少人呢？

李桂珍：非常严格。不准男生探访，不准随便上街，一个星期只有一个下午放假。

胡筱：我们入学的时候有21人，可最终只有7个人毕业。这7个人后来都留在医院里当护士。

记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毕不了业呢？

胡筱：我们毕业的时候要考甄别试，既要考理论也要考操作。甄别试不及格的人就被淘汰了，不能顺利毕业。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医院里的病人太恐怖了，所以自己中途退出了。

李桂珍：最终的毕业试先是医院自己考，然后全市统考，也就是会考。考完之后，进行分配。我们被分配到本院，有些被外派。

胡筱：毕业了就不用再穿蓝袖了，所以我们都很高兴。没有毕业的护生都是穿蓝袖的，毕了业的就能穿白制服。

记者：你们毕业的时候有毕业证吗？有说是什么学位吗？

胡筱：有啊，当时由“家公”(博济医院院长嘉惠霖)给我们颁发的。毕业证上面还有青天白日旗。上面就写着护校毕业，没说什么学位。

二、贵族医院，苦乐参半

记者：你们毕业的时候，医院大概是什么情况？有多少个科室？

李桂珍：我们毕业的时候是1948年。解放前，博济医院是由美国人管理的，院长也是美国人。这间医院方方面面都比较正规，各项工作都用英文，开医嘱、查房都用英文。

胡筱：当时博济医院的规模不是很大，病人数量大概是70人左右，护士大概是40人，医生的数量更少。医院设有内、外、皮肤、耳鼻喉及妇科、产科、儿科、眼科、口腔科等科室。护理部是后来才设立的。大概从五十年代开始，医院里设有一个负责管理护理工作的人。在此之前，护士的工作和岗位大多是由外科和内科的护长分配的。

记者：当时的博济医院在广东省声望如何？

李桂珍：美国人办的医院，当然很出名、很高级。

胡筱：如果来看病的病人没有钱，医生就会很直接地跟他说：“没钱的话，你就去方便医院吧。”方便医院其实就是平民医院，当时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是方便医院。方便医院看病比较便宜，对实在无法承担医药费的病人还提供免费治疗。但是，方便医院的环境比较差，没有专门的重病区，普通病人和重症病人住在一起。甚至其中还有一些传染病病人也没隔离开，会导致互相传染，治疗效果也没那么好。

记者：当时广州市除了博济医院以外，还有别的贵族医院吗？

胡筱：有，柔济医院(即今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在东山那边。博济和柔济是齐名的。

记者：当时医院里的外国医生多不多？

胡筱：医生多数是中国人，但管理阶层有部分外国人。“家公”、“家婆”是美国人，药房负责人是德国人。

李桂珍：因为医院当时是由岭南大学董事会管理的(1930年，博济医院管理权由广州医学传道会转给岭南大学董事会)，故而很多医生是从岭大毕业的。也有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像妇产科郑惠国教授就是从德国回来的。

记者：你们能成为“贵族医院”的护士，内心会特别自豪吗？

胡筱：当时内心的确会感到比较自豪，因为感觉自身比平民医院的护士要高级。但是，也有部分护士嫌弃贵族医院工作辛苦，后来去了方便医院的。

当时医院的病房也是有区分的，每个病区大概有普通病床20张，贵族病床4到5张。贵族病房的病人可自由出入。当时来博济医院的病人都是富裕阶层。很多有钱人即使没有病也要来医院住一下，就是为了让医院里的特护陪他们散一下步。

记者：什么是特护呢？

胡筱：特护是病人另外付钱请的。这些特护都从护校毕业，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与一般护士不同，他们平时不用在医院上班。病人提出要请特护，护理部就会联系她们来上班。

记者：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人？

胡筱：红线女以前经常来博济医院看病，她比较喜欢看中医、吃中药。有一次，红线女来内科住院。我们的内科主任和医生都对她感到非常好奇，说想一起去检查一下她的声带，研究一下她为什么那么会唱戏。然后，一群医生和主任穿得整整齐齐去红线女的病房查房。结果，一敲门没人，原来红线女上街去了。

记者：美国人做院长，那你们有信教吗？

胡筱：有啊。以前医院隔壁就是教堂，我们每逢周日就要去做礼拜，去教堂唱诗。凡是周日去唱诗的护生，那天吃饭堂还可以加菜。我还记得毕业考试时，护理部的主任问：“你们怎么还不去祈祷呀？”逢到圣诞节，医院饭堂会杀猪庆祝。有钱的就可以买猪肉吃，我们7个新护士没钱，就买一盘猪血打牙祭。

记者：“家公”“家婆”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胡筱：1948年，嘉惠霖院长退休，返回美国。之后，岭南大学医学院派了一个姓汤的院长过来主持工作。

记者：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改称中山二院呢？什么时候医院的规模开始变大呢？

李桂珍：大概是1957年左右，中国人接手之后，就把原来的博济医院改名为中山二院。后来，又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

胡筱：医院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并不是突然变大的。

记者：当时一个护士要照顾多少病人？

胡筱：整间病房都由一个人来打理。一个科室大约有6个护士，包括夜班和日班，病人则有30多个。我们十分忙碌，根本停不下来。穿的白制服从不会变皱，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

李桂珍：不像现在，当时我们照顾病人都是全包的，生活护理等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到位，帮病人洗头、漱口、清理大小便等等。

记者：最长试过工作多久呢？

胡筱：最长是一班到底(不分日班、夜班)吧，超过12个小时。50年代的时候，医院要求多做贡献，医生和护士都加班加点。但实行没多久，很多人都受不了，一方面是身体问题，另一方面是家庭负担。

记者：当时护士之间是如何交接班的？

胡筱：我们基本都是通过口头来交接班。交班的时候，我们会重点交代重症病人的病情特征，一般病人就不会交代得那么详细。医生的病历记录和护士的病情记录都是写在order book上的，包括医生的医嘱也写在上面。我们执行完医生的医嘱，是要签名的。

三、圆梦天使，一生坚守

记者：李老师是何时进入妇产科工作？

李桂珍：刚进医院时，我们要到每一个科室去轮岗。轮完岗之后，我最终选择了妇产科。因为我对手术感到很害怕，不敢去外科。

记者：当时妇产科的设备如何？

李桂珍：在当时来说，我们科室的设备算是很先进的了，有部分机器还是从国外购置回来的。

记者：当时的医患关系如何？

李桂珍：比现在和谐多了，绝对不会有病人殴打医生的情况。从前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记者：您在妇产科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李桂珍：我毕业之后，在妇产科当护长，工作挺繁忙的。起初，医院只有妇科门诊，随后才有了产科和住院。所以我们属于妇产科开科的那一批工作人员。当时科室手术挺多，基本每天都有。手术水平也很高，主要有全宫切除、盆腔清扫等。我们产科很早就有剖腹产了，但是并不会像现在的医疗界这样轻易就让病人剖腹产。

记者：你这么多年来一共接生过多少孩子？

李桂珍：记不清了。其实呢，我在护校的时候并没有学过妇产科。在妇产科当了护长以后，郑惠国教授派我去中山一院学习了半年，回来以后才能进入产房接生。记得最高峰的时候，一晚上要接生好几个小孩。

记者：这么多年来在妇产科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医疗事故？

李桂珍：我工作比较细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医疗事故。有一次要给病人输血，但是血库那边供错了血型，我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为此，医院还挂起红旗来表扬我。

记者：您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妇产科吗？

李桂珍：是的。我一直在妇产科工作到60岁才退休。本来是55岁退休的，由于那时医院开展做药扎(注射药物进入输卵管，药物结晶后使输卵管堵塞以避孕)，所以医院一直留下我工作。我们医院的药扎绝育手术具有开创性，其避孕成功率大约为百分之八十。后来，政策还规定不进行药扎，就要开刀。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药扎，我们的工作量也变得越来越大，有时一早上要做十多个药扎。

记者：胡老师，可以讲一下您毕业后进入医院是什么情况吗？

胡筱：我进入医院之后，先是到各个科室轮岗，后来去了夜班总值这个岗位。当时的护理部主任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过来的，叫江专群。当她知道是我负责夜班总值后，就对我说，你那么年轻，不应该负责这个工作，夜班总值应该找一些年纪大的护士。因为，当时值夜班是要负责整间医院病人的护理工作，无论重症还是轻症，同时也要负责急诊室，责任很重大。由于我刚毕业没多久，故她认为安排我在这个职位不合适，就把我调出来开办医院的供应室。我先去供应室，然后到外科，最后到耳鼻喉科。

记者：外科在当时属于大科吧？

胡筱：是的，外科属于大科，护士有六七人，平均每个病区30多个病人吧。因为博济医院当时算的上贵族医院，所以设备方面比较先进。院长非常重视人才，经常重金礼聘一些高水平的医生和护士。

记者：那您在医院工作了那么久，有没有至今仍难忘的事情？

胡筱：有。曾经我们病区有一个重症病人。一天，医生吩咐护士给他打了一支高渗葡萄糖。没想到打完后，病人死了。当时，这件事在医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起初，大家还以为是护士打错针了。但经过调查后，主任说：“医生根本就不应该给他打那支针。因为病人本来已经病危了，打的那支针是进一步刺激他，加速他的死亡。”

记者：最后这个医疗事故怎么处理？病人的家属有到医院闹事吗？

胡筱：记得当时没有处理医生和护士，因为病人病情本来很重，病人的家属也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没有闹事。不过，当时的病人和家属都很信任医生，一切都是医生说了算。

记者：两位老师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附属二院吗？

胡筱：我曾经离开过。到了耳鼻喉科后，我被下放到湛江四年，从1970到1974年。当时医院组织医疗人员上山下乡。其实，我根本不会看病，但老百姓却把我看成是省城来的“大医生”。

李桂珍：我比较幸运，不用下乡。因为我是工人出身，我爸爸是工人，在香港打工。

胡筱：难怪，我是华侨出身，带一点小资产阶级性质。在特殊时期，我们晚上开完会还要写大字报。没有写够二十条大字报，是不允许回家的。我们实在写不出来，只能相互抄。

记者：文革期间，医院是由谁管理呢？

胡筱：当时工宣队进驻医院，由他们掌控医院。

记者：那当时面临批斗，有受不了的吗？

胡筱：当然有，外科有一个医生受不住，上吊自杀了。这个医生的手术水平很高，刀术很厉害，但是被工宣队宣布为“反革命”。文革过后，不少受过迫害的医生和护士都设法去了美国。所以，当时很多人说“美国可以再开一家中山医”。

李桂珍：跟我一同在妇产科工作的另一个护长也被戴高帽了，当时我心里很害怕自己也会被批斗。但由于我出身比较好，所以没有遭受过这些痛苦。

四、医护相扶，情怀不老

记者：作为护士，要配合医生工作。那你们有没有和什么著名的教授或医生合作过呀？

李桂珍：有，我们妇产科的郑惠国主任是留学德国回来的。但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女现在为他出了一本书。当初，我和他，还有几个教授(邝健全、潘国权、何秀琼)，总共七个人，一起开科。现在只剩下我和邝健全了。我跟郑教授在工作上的接触还是很多的，辅助他很多方面的工作。他对病人很好，所以也有很多病人找他。

记者：郑教授和你们之间有些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吗？

李桂珍：他和我们护士、医生和工友也相处得很好。在被批斗的时候，他跪在那里，我们妇产科一个医生还踢他。看到那个场景，我感觉很心痛。我结了婚之后，很久都没怀上小孩。他很关心我，经常医治我，还为我做了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后来我还真的怀上了小孩。所以，我一直都对他心存感谢。

胡筱：她生小孩的时候，两大教授在产房门口等着，其中一个是郑惠国。他们担心她生不出来，随时准备为她做手术。

记者：两位老师对以前的老教授有什么印象吗？

李桂珍：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的。我们妇产科的教授、医生和护士像一家人一样，很团结。我们这些退了休的，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四都会聚在一起喝早茶。

胡筱：老教授们对病人都很不错，医术又高明，所以很多病人找他们。

洗尽铅华始见真

——回忆孙逸仙纪念医院刘泽生教授

孙逸仙纪念医院 刘品明

2013年7月，刘泽生教授生前珍藏书籍赠予医院仪式刚刚完毕，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够将刘泽生教授生前发表的各类文章集结成册，辅以各类回忆怀念的文字，以表达对逝者的感怀和敬重之情。

许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是幸运的，在初涉医学的殿堂里能够得到许多大师级前辈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点。像我们医院心内科的梅伯英、张旭明、朱纯石、谷小鸣、刘泽生等诸位老师，他们毕业于不同的医学院校，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精神气质，因而人人个性鲜明、魅力十足，使得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能有机会博众家之所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其中，如梅伯英教授，缅甸华侨的背景，上世纪50年代初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毕业时已步入解放后第一次院系调整后的中山医学院了。梅教授聪明睿智，临床悟性让人折服，查起房来总是言简意赅、直奔主题。张旭明教授是中山医学院的毕业生，也是我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导师，在我读研期间，张教授一直担任着医院院长职务，我至今还能感受到张旭明老师当年为了医院发展事必躬亲、任劳任怨的步伐；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学术上一丝不苟、造诣很高。那时我们心内科的当家人是朱纯石教授，朱教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他在80年初期主编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人工心脏起博和电复律》一书，是那个年代心血管领域的畅销书，也是全国各地许多心血管医生的案头书，很有学术影响。和朱教授同时步入医院，毕业于南京医学院的谷小鸣教授，是很典型的学院派教授。听他查房非常受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对我们的考试加分往往有直接的帮助。

我刚进入临床研究生轮科阶段时，就听说心内科还有一位刘泽生教授，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是我们内科老前辈、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刘世强教授的女儿，彼时正在美国留学。我当时心里还很好奇，父女俩都是我们内科的教授，挺出彩的。

刘泽生教授从美国研修归来后就一直在心电图室工作，我也是一年后在心电图室轮科时第一次接触到刘泽生教授并立刻领略了她的真知灼见。记得我当时给一位中年男性住院患者做完心电图，见心电图申请单上只填写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长期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此次因气促入院。我的印象是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其余看不出什么端倪。我就将图给到了审核报告的刘泽生教授，刘教授一边拿着分规测量着心电图，一边指导我如何来分析判断一份心电图。对于这份心电图，刘教授解释说QT间期轻微延长，主要为ST段平直延长所致，左胸导联T波高耸状，升降两肢对称底部收窄，结合病史描述，符合低血钙伴高血钾的表现。刘教授很负责地让我第一时间向病房报告了我们的心电图判断，随后病房的急诊化验检查结果的确印证了刘教授的判断。

在一般人的眼里，刘泽生教授有些异样，永远是一副男式平头的装束，总是习惯性的穿着一双军用胶鞋。刘泽生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的外表也许是孤独的，在人群中话语不多，但一旦她和你熟络，话匣子一打开，言语谈吐之间，刘教授很有几分豪爽和热情。我不止一次能体会到她对后辈的关心和扶掖。许多年前，我们科里收了一位来自北非的留学生，由于没有中文基础，这位留学生学习和生活上倍感吃力，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焦虑当中。这时，刘泽生教授伸出了援手，耐心细致地开导他，在专业上辅导他。刘泽生教授知道我粗通法语，还特意交代我务必要去帮助辅导这位留学生。我当时想，刘泽生老师的古道热肠，主动去帮助这位留学生，源于她十分了解一个年轻人为了事业前途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所面临的困难，而这种困难或多或少也是我们在国外进修期间所经历的。

刘泽生教授是乐观的、热爱生活的。外表的孤独丝毫掩饰不住她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这些总能体现在刘泽生教授的字里行间中。刘泽生教授喜欢写作是出了名的。我经常在《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副刊园地栏读到刘泽生教授的杂文或随笔。包括叙述她在美国的见闻，如何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白色圣诞。其中有一篇《何必算命》的杂文充满着人生哲理，令人印象深刻。文章大意是姑且不去计较算命是否科学，人生对于未来、对于命运就应该留点悬念和未知，这样才会拥有去努力、去拼搏、去奋斗的动力，何必算命。另外还指出，算命本身可能就有很强的暗示作用。譬如，被算出60岁有个很大的坎，笃信者在60岁来临之际，往往日思夜寐，殚精竭虑，结果是惊魂失魄，一病不起，终于一头栽了进去。刘泽生教授的这篇杂文透射出智者熠熠的思想光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道出了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的朴素真谛。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广厦千间，夜宿仅需六尺。读刘泽生教授的文章，总有一种力量和共鸣直抵人心。

对于我们来说，刘泽生老师最难能可贵的是对我们医院岁月流逝积淀下来的史料与记录的梳理与考证，其中有多篇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这是她贡献给我们医院的宝贵精神财富。我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当时的晚清政府仍然实行海禁，广州作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拥有“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通过这一口岸，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也使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英国政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疯狂走私毒品鸦片，牟取暴利，也成为日后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医学传教士的涌入，西学东渐，西医这棵树种就这样首先选择了广州从而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

(下转三版)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卢旖维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